

晚清公派幼童留美计划与江苏

姜新, 小雨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晚清; 留学计划; 江苏; 容闳

[摘要] 晚清公派幼童留美计划酝酿于江苏, 江苏给予留学计划设计者容闳荣誉与声望, 构造了留学计划与权利结合的桥梁。江苏给予留学计划新的信息, 使之从模糊的构想变为清晰的计划。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起步于江苏, 预备学校建于此, 主要经费源于此, 众多幼童来于此, 江苏成为留学计划的实施基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之所以选择江苏, 是因为其地缘上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提供了留学计划必需的阳光、雨露和营养。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4)02-0023-04

1872年, 一艘轮船载着30名中国幼童, 乘风破浪穿越广袤的大洋, 驶向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派留学开始了。这一石破天惊的大事一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学界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不过, 由于所站角度不同, 以往论著忽略了这一事件与江苏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江苏——留学计划的孵化器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计划大略于胸中矣。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 盖皆以此为标准, 专心致志以为之。朔自1854年予毕业之时, 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 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1] (P86)} 公派留美计划设计者容闳的追述, 反映了计划者的远大志向, 也反映了从“大略”构想到“成熟”计划的艰难曲折。江苏则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孵化器的角色。

在当时的中国, 要实现惊世骇俗的“留学计划”,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计划本身的切实可行; 二是得到权力机构的赞成支持。容闳回国后, 便为实现这些条件而努力。

“留学计划”的孵化期是漫长的。1855年, 容

闳到广州找美国公使伯驾, 试图通过伯驾结识权贵, 寻求对“留学计划”的支持, 结果失败。同年, 他前往香港, 希望会见清廷大员, 获取对“留学计划”的赞同, 结果依然失败。“留学计划”并没有在构想者的家乡开花结果。

多次的失败迫使容闳改换门庭, 他将目光投向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江苏。1856年, 容闳到上海海关游说。1857年, 他在上海社会名流中宣传。1860年, 他潜入南京, 希望借助太平天国实施“留学计划”。表面上, 几年的艰辛并没有让人们接受“留学计划”, 事实上, 辛勤的努力正在为“留学计划”铺设道路。广泛的交游拓宽了观察的视野, 使容闳较为深刻地认识了国情, 原来国语不通的“洋学生”终于融入中国社会, 了解了百姓的生活, 知道了政府的“规矩”。反复的宣传促进了周密的思考, 使“留学计划”日趋缜密, 远大理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一个“大略”的设想变成了具体可行的计划。1868年, 容闳前往苏州, 向丁日昌游说留学计划, 得到丁的赞许, 表示愿意向当权的文祥转达。容闳迅速撰写条陈四则, 其中心是派遣留学生。条陈明确提出留学的目的是“为国家储蓄人才”, 具体方法是“初次可先派一百二十名名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 又分为四批, 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1] (P122)}, 并且计划了

[收稿日期] 2003-11-21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2001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留学生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主持人周棉)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姜新(1952—), 男, 北京人,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具体的管理措施、经费来源。无论是条陈撰写的速度,还是条陈的内容,都证明此时容闳早已胸有成竹。

尽管由于文祥的病故,“留学计划”未能立即实施,但是,它已经从个人的粗略设想变成受人关注呼之欲出的维新计划。果然,1870年,容闳再次建议派遣留学生时,清政府予以正式批准,“留学计划”终于开始实施。从容闳归国到“留学计划”被政府接受,前后漫漫16年,其中11年容闳在江苏活动,最终,“留学计划”在江苏落地生根。

“留学计划”与当权者(主要是曾国藩)的联系纽带是复杂的。纽带之一是“留学计划”设计者的名望。当权者不会平白无故青睐无名之辈,容闳精通西学的名望成为结识权贵的名片,凭借这张名片,1863年,容闳见到了“求贤若渴”的曾国藩,以后这种名望又为其结识丁日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开辟了道路。纽带之二是机器。曾国藩交给容闳的第一个任务是出国购买机器,当容闳完成购买机器任务的时候,卓越的功劳、勤奋的表现博得了曾国藩的信任。纽带之三是新式学校。1867年,容闳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被曾国藩欣然接受,容闳进一步得到献计上策的资格,对此,容闳洋洋自得地回忆道:“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锋芒。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1] (P93)}。纽带之四是官职。容闳结识曾国藩后,便被授以五品官职,这便为他更广泛地结交权贵,争取“留学计划”实施创造了条件。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上述所有纽带都连接江苏。赢得精通西学的名望源于容闳在江苏的活动;购自美国的机器安装在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一半来自江苏海关;兵工学校设立于上海,其基础是上海广方言馆;就连容闳的官职也明确地标明“江苏同知”的字样。正是这一根根纽带推动着“留学计划”与权利的结合,加速着“留学计划”的孵化。

“留学计划”是一批热心西学的人们努力的结晶,他们同样与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引荐容闳与曾国藩见面的是曾长期在江苏上海活动的李善兰、张世贵;帮助容闳揣摩曾国藩心理,出谋划策的是无锡的华蘅芳和徐寿;协助容闳完成“留学计划”条陈的是一位“南京友人”;在“留学计划”酝酿过程中,一批任职江苏的官吏作出了重要贡献。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大力支持“留学计划”,建议容闳撰写条陈,促成了“计划”的诞生;接着,又穿针引线多次向清政府推荐“计划”,先向文

祥转达“计划”,后来与曾国藩就“计划”反复磋商,促成了“计划”的实施,对于“留学计划”,真是“志同道合”,“勇往不缩”^{[1] (P122)}。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更是为“留学计划”呕心沥血,百般筹划,不仅对容闳、丁日昌的建议表示“深韪其言”,而且与李鸿章等大臣“往返函商”,多次上奏清政府要求派遣留学生。正是在曾国藩的努力下,“留学计划”进一步系统化,留学的意义被上升到“洞澈”西学“本源”,“徐图”国家“日强”的高度。留学的方法被具体成洋洋数千言的章程,从对外联络、选派人员到督促学习、筹措经费等等都详细筹划^[2]。

二、江苏——留学计划的实施基地

1870年冬,清政府批准“留学计划”,“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曾国藩与容闳在江苏重镇南京,进行了周密的商谈,确定了实施留学计划的四项具体工作:一、设立预备学校;二、选派留学人员;三、筹集留学经费;四、酌定留学期限^{[1] (P153)}。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一个稳固的基地,江苏承载了这一重任。

设立预备学校是实施留学计划的起点。1871年,清政府在松江府设立出洋预备学校,刘翰清、吴子石分别担任正副校长,聘请曾来顺与他的两个儿子曾子睦与曾子安为英语教师,又聘请陈姓、黄姓、乔姓三名中文教师。出国留美幼童在这里学习半年,主要课程是中文与英文等基础知识。学校对幼童要求十分严格,只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放假,成绩不佳与违反校规的人要受到打竹板等体罚^{[3] (P74)}。预备学校为那些10多岁的幼童奠定了初步的语言基础,江苏成为中国幼童跨洋留学的重要踏板。

招生选材是实施留学计划一大难点。对此,曾国藩分析说:“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2]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世界仍然茫然无知,对于飘洋过海心存疑虑,容闳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任务。在相继留美的人员当中,江苏籍儿童占有相当比例。1872年至1875年赴美留学幼童共计120人,江苏籍儿童22人,占18.3%,在各省留学幼童人数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广东省,远远超过其他各省。考虑到广东籍儿童中相当一批来自香港,江苏儿童在留学人员中的数量更是举足轻重。值得注意的是,在四批留美幼童中,江苏籍儿童人数逐步上升。第一批幼童中只有3人是江苏籍,

仅占 10%，而在第三、四批幼童中已分别有 8 人和 9 人是江苏籍，已接近当批全部人员的 30%（见表 1），显示了江苏人对留学事业日见积极的态度。江苏成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的重要生源地。

表 1 留美幼童籍贯分布统计表^{[4] (P11-19)}

籍贯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江苏省	3	10	2	6.7	8	26.7	9	30	22	18.3
广东省	24	80	24	80	17	56.7	18	60	83	69.2
浙江省	0	0	4	13.3	2	6.7	2	6.7	8	6.7
安徽省	1	3.3	0	0	2	6.7	1	3.3	4	3.3
福建省	1	3.3	0	0	1	3.3	0	0	2	1.7
山东省	1	3.3	0	0	0	0	0	0	1	0.8
合计	30	100	30	100	30	100	30	100	120	100

筹集留学经费是实施“留学计划”的又一大难点。曾国藩说：“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又难。”^[2]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财政十分困窘，洋务运动中练兵办厂又消耗了大笔资金，清政府的财政更是捉襟见肘。留学计划规模较大，所需经费数目巨大，据容闳、曾国藩等人推算，留学所需各种费用合计每年大约 6 万两 ~ 8 万两，以 20 年计算，总计约 120 两白银^[3]。在当时，筹措如此之大的经费的确是困难的，江苏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曾国藩等人反复协商建议留学所需费用由收入较为丰厚的江苏海关承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留学计划启动以后，“每年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设立于美国的留学事务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通筹拨银两，协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设立于上海的预备学校等机关）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2]尽管留学经费每年变动较大，而且于 1881 年中止，实际经费难以核实，但其数量浩大却毫无疑问。1881 年，李鸿章在中止留学的争议中曾说：“况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5]便是明证。江苏成为“留学计划”经费的主要来源地。

三、江苏——吸引留学计划的地缘优势

从表面看，在留学计划孵化过程中，容闳受英国律师排挤离开香港是一种偶然，留学计划通过种种线索与曾国藩、丁日昌等当权者相连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容闳离港后，将其“计划”的“孵化地”选择在江苏，连结“计划”与当权者的纽带都指向江苏，却不能仅仅以偶然和巧合来解释。在“留学计划”实施过程中，设点、筹资、招生诸事务都以江

苏上海为基地，则更显现出寓于偶然现象后的历史必然。

江苏（上海）对留学计划的巨大引力是其区位优势。首先，交通便利。留学事业是人员的交流，是信息的沟通，这一事业与交通有着天然的联系，理所当然将交通便利作为选择基地的条件之一。在近代交通手段尚未普及之时，江苏有京杭运河纵贯南北，万里长江横通东西，近代以后，海运发达，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进一步使江苏尤其是上海，成为联系南北、交通内外的枢纽。这样，江苏成为留学的基地则是天经地义。区位优势还表现为政治的边缘性。“留学”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抵制与反对，因此主持人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希望减少阻力。江苏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只不过是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县城，在那里办洋学，读洋书，学洋话，于我华夏形象，虽有影响，但不太大。同是举办外语学校，在所谓首善之区的北京，一大批名臣大儒群起而攻之，掀起轩然大波，而在边缘之地的上海，却风平浪静，相对顺利，便是明显例证。这样江苏上海成为首批官派留学计划的起点则是顺理成章。

江苏对留学计划的另一引力是经济优势。江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富庶的地区之一，进入近代以后，更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一方面，对外贸易蓬勃发展。19 世纪 50 年代，中国贸易中心已由广州转至江苏的上海。江苏海关一关出口的茶叶生丝远远超过粤、闽两关总数。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海关出口总额达 2 600 万海关两，相当于广州的 4 倍。同期，上海海关进口商品也激增。19 世纪 60 年代末，进口商品价值达到 4 900 万海关两，是广州海关 9.8 倍^{[6] (P70)}。另一方面，新式工业破土而出。除了外国人建立了各种企业以外，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也相继诞生，江苏尤其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基地。

经济优势有力地推动了留学计划，第一，给予“计划”经济支持。在计划的孵化期，海关、洋行、通商贸易吸引和哺育着“计划”的设计人。如果没有江苏海关的工资，宝顺洋行的佣金，饥寒交迫的容闳很难完善其“计划”，更谈不上交结权贵，付诸实施。在计划的实施期，正是江海关的丰富税源支付着“计划”的巨大财政支出。第二，为“留学计划”开辟道路。经济发达，洋行林立，新式企业诞生，要求教育提供外语、经贸、科技等各方面人才。这种需求不仅直接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员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途径，而且冲击了

人们头脑中“重理轻艺”的传统观念。

江苏对留学计划最直接、最巨大的引力是文化优势。文化优势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率先与广泛。留学事业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高级形式,只有在文化交流达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较大规模留学的需求才可能出现,只有文化交流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留学事业才可能为社会广泛承认。19世纪60—70年代的江苏尤其是上海是中外交流的前沿,两次鸦片战争发生,上海、南京、镇江相继开埠,英、美、法租界先后建立,各国天主教、基督教接踵而至,上海成为外国侨民最多城市的同时,文化交流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850年至1871年,仅上海就出现了《北华捷报》(1850)、《中国之友》(1860)、《美国月报》(1867)、《顽童》(1871)等外文报刊15种^[1](P60);建立了墨海书馆(1843)、美华书馆(1960)、土山湾印书馆(1860)、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等西书翻译出版机构^[2](P112)。外国人、外文报、外国书同外国货一起告诉人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刺激着人们了解世界、跨出国门的愿望,引导人们更广泛地参与文化交流中。正是这种环境影响了部分家长,促使他们不受流言的蛊惑,勇敢地将孩子送往海外。

江苏文化优势之二是新式教育发达。近代江苏率先出现了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这些新式学校打破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改变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内容,抛弃了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体现了科学、人文精神,它们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西学传播的渠道。其实,留学教育正是新式教育的提高与发展。对此,曾国藩、李鸿章在奏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时,已经有所认识,他们在奏折中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认为新式学校的创办是新式教育包括留学教育的根基,而留学教育则是新式教育必然发展阶段、必要内容,因为“百闻”终究“不如一见”^[3]。

江苏文化优势之三是文化名人荟萃。19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的压力、上海开化的引力,将一批文化名人聚集于上海。其中有由墨海书馆联系的王韬、李善兰、赵烈文等人,也有集合在上海制造局、广方言馆内的徐寿、华蘅芳等人。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已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倒与容闳这样的“洋学生”一拍即合。容闳曾说,自己舍广东、香港,长期流连于江苏上海,“第一目的”便是“藉此以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游”^[4](P104)。毫无疑问,这批惺惺惜惺惺的新文化名人正是容闳结交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容闳这些江苏上海的朋友为其“留学计划”牵线搭桥,反复呼吁,遂成为“计划”实现的强大助力。

[参 考 文 献]

[1] 容闳. 西学东渐[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 曾国藩.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A].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82[C].

[3] 温秉忠. 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A].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C].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

[4] 温秉忠. 最先留美同学录[A]. 近代史资料[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5] 李鸿章.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A]. 译署函稿: 卷12[C].

[6] 汪敬虞.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Plan of Send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America in the Late Qing

JIANG Xin

(History Department,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lan of study abroad; Jiangsu; Rong Hong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lan of send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America is conceived in Jiangsu Province, where Rong Hong the designer of the plan gains much honour and prestige for he has combined the plan and the right of studying abroad. 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plan is provided in Jiangsu, making the initial design become clearer. Jiangsu becomes the sources of study-abroad plans because the superiority in geography, economy and culture is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study-abroad plans.

[责任编辑: 刘一兵]